



红镜头中的 周恩来

顾保孜 著
杜修贤 摄影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镜头中的周恩来 / 顾保孜著 .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 2011.6

ISBN 978-7-221-09599-2

I . ①红… II . ①顾… III . ①周恩来—传记
IV . ①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0810 号

红镜头中的周恩来

顾保孜 著 杜修贤 摄影

出版统筹 曹维琼

责任编辑 陈 荣 康征宇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北京诚信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16

定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 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引言

当我们看到这一张张栩栩如生的照片，仿佛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又回到了人民中间。他那脸上绽放的笑容是在告诉世界：中国人民自豪地站了起来，中国人民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那蹙起的浓眉和沉思面孔仿佛又在告诫国人：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要赶上世界强国，我们要只争朝夕，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他那永远不知疲倦和风度翩翩的身影，又像回到了彻夜通明的西花厅，回到了总理的岗位上。

我们要感谢摄影师，是他们用历史的巨笔——“红镜头”书写了这一个个动人和永恒的瞬间。

打开“瞬间”背后的故事，我们发现一个真实立体的周恩来向我们走来。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情满西花厅/1

在担任政府总理二十六年多的时间里，在处理内政、外交和大小公务活动中，他那自觉的强烈的公仆意识是无所不在的，正像他自己说的：“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完最后一根丝。”

第二章 走近周恩来/27

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既“寒”又“暖”。“寒”是指他的严要求，而这种严往往不讲任何情面的。他们虽然在总理身边却没有一点“神气”，“夹着尾巴做人”是他们的原则。可是在严的背后是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的尊重、体谅和关心，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温暖。

第三章 心系大庆和大寨/51

也许是作为国民经济的“总管家”，周恩来更深切地感到实现石油自给的喜悦与自豪，1962年、1963年、1966年曾三次视察大庆。在短短的四年中，三次视察一个大企业，这在周恩来的总理生涯中还是较为鲜见的。

第四章 “宰相”肚里装着百姓寒/77

早在1956年，第一个五年计划还有一年就要完成，“冒进”的苗头开始显露出来的时候，他就发现经济建设速度过快，突飞猛进的背后似乎预告着某种灾祸，惊人上涨的数字不一定是个好预兆。他开始考察、思考，进而感到不安。



第五章 追寻历史的足迹 / 92

面对度过了十年艰难岁月的延安，周恩来的神情特别兴奋，特别激动。延安这块与中国革命命运紧密相连的地方，曾经记载过中国革命事业的昨天。

第六章 大树护英才 / 109

这种和洽、真诚和亲密情绪几乎能从每一张周恩来和文艺界人士合影中散发出来，强烈地感染了今天的人们。不难想象，当年的周总理已经走进每一位艺术家的心田里，他的音容笑貌定格在一个时代的相框里。

第七章 “文革”前的辉煌“绝唱” / 130

《东方红》的每一场、每一个细节，从歌词、歌曲、乐曲、朗诵词以及服装道具舞美等表演艺术手段的设计，都经周总理审定，渗透着他老人家的心血。每一次分场排演，他都亲自审看。

第八章 “样板戏”的戏外戏 / 146

“样板戏”电影自始至终没有个人名字的一撇一捺，但是，他们的形象留在了那个特定的时代，也被观众的记忆带到了今天。可是在幕后工作的摄制人员呢？真真是默默无闻地度过了辉煌时代，送走了火红的岁月，现在仍然是在默默无闻中回忆往事。

第九章 战友之情 / 171

蔡畅与周恩来从法国认识起，几十年艰难险阻、风雨征程，他们从来都是笑迎困难坦然面对死亡，眼泪不属于他们这些坚强的革命者！最后的告别，依然不能用眼泪作为句号。



第十章 最后的欢聚和重托/178

周总理在“文革”中遭遇困难，进退维谷，但他仍然没有忘记十年前提出的强国梦——“四个现代化”，尽管要圆这个梦是那么艰巨，那么曲折，几乎耗尽了他的所有精力和心血！

第十一章 落下巨人的帷幕/188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毛泽东头像和“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组成的一枚像章。从这枚像章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这枚像章，周恩来从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像章来替换。这无疑反映着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

第十二章 收到马克思的请帖/213

他们臂戴黑纱，胸缀白花，任凭寒风吹打，伫立在长安大街两旁。他们的心情如这天空一般阴沉哀痛，默默等候着。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在世界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隆重、如此悲壮的葬礼。

第二章

情满西花厅

周恩来是一个真正的忠实、高效、廉洁的人民公仆。他一生都在实践着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担任政府总理二十六年多的时间里，在处理内政、外交和大小公务活动中，他那自觉的强烈的公仆意识是无所不在的，正像他自己说的：“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完最后一根丝。”

自从周恩来爱上了西花厅，一住就是二十六年。 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风格

自天安门广场往西经过新华门继续向前直到府右街南口（六部口），由此向北转弯沿中南海红墙一直到达近府右街北口处，见到那个有国徽的西北门往里向左手一拐便是西花厅。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统年间修建的那种京城常见的旧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因年代久远，青砖灰瓦的屋宇，廊柱暗红陈旧，雕梁画栋亦已褪色斑驳，已不见昔日王府的豪华气派。

西花厅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前院进门不远处可见一座小假山屏挡路人视线，茂密而细长的修竹环绕着它。院内自南向北的一条弯曲长廊隔在汽车道西侧，长廊中段设一凉亭，它的南端往西拐到尽头处筑一小巧的水榭，池子里没有放水，也就没有鱼虫水草和莲藕，常年干着。如今西花厅院内的房屋、亭子、长廊、水榭等建筑物看来已相当陈旧，但整个院子绿化得很好，树木花草繁茂，修剪整齐，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略有一点花草芳香，树上的知了鸣叫不停。



■ 60年代，周恩来和邓颖超常在西花厅前厅会见外宾

西花厅前院有一个漂亮气派的前厅，建在约一米高的平台上，是周总理接待与宴请外国宾客的地方。平台下边有一椭圆形花坛，四周栽低矮的常青树环绕，中央栽着周总理和邓颖超都喜爱的芍药花和月季花。花坛亦是交通标志，是来往汽车的环形岛，周总理和邓颖超经常来这里散步赏花。

西花厅的海棠花向为中南海及熟悉总理家的人士所称誉。每年初夏时节，后院里的海棠花盛开，每棵树上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花朵，芳香四溢，引来无数彩蝶纷飞，蜜蜂嗡嗡地叫着忙个不停。在此优美而宁静的环境里，蕴含着盎然生机。

后院的面积不大，是周恩来办公与居住区。一片绿地上满院海棠树，有几棵梨树、桃树和白皮松。周恩来办公室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红色的廊柱绿色的窗框，下面的窗户镶着大块玻璃，上面是纱窗再加玻璃窗。每当风和日丽的时候，打开面向院子的玻璃窗，拉开白色的窗幔，室内就顿时亮堂起来。

周恩来办公室西隔壁有一个稍大些的房间称作“活动室”。室内有一张乒乓球桌子，北侧与西墙根处立着书橱，里边藏书主要是文、史、哲类的图书。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将“活动室”习惯地称之为“乒乓球房”，或干脆就叫“球房”。打乒乓球是周恩来在办公间隙唯一喜爱的活动腿脚的方式。常有警卫、秘书、医生陪他打球。周恩来右臂肘关节伤残屈曲，活动不方便。加上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挥拍抽杀，就像董必武说的，是打“卫生球”。

西厢房为工作人员办公处，东厢房为临时“客房”，来客作短暂住宿用。工作人员在西花厅十年只见过周恩来的亲侄女在这里短期住过几次，未见过别人来住过。

办公室往东是客厅，现在时髦的说法可称之为“多功能厅”。这儿是周恩来、邓颖超用餐、休息的地方，也是两位房主人在此会客，与亲属团聚所在地。邓颖超在此看电视。



■ 1970年10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西花厅

由客厅往里（朝东）便是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邓大姐卧室隔壁是周恩来的卧室，周恩来卧室的东墙外是一条内走廊，这里有书架，存放一些旧书刊和文史资料类图书。当初设计这条内走廊的人，想必考虑冬季保温、夏季隔热以及隔音作用。

周恩来卧室内家具陈设极其简单。因为他一进卧室就上床，身后用枕头垫着斜靠在床头继续办公。他睡的是一张普通木床，下面用的是南方人喜爱的棕绷床垫。这很可能同他祖籍是浙江绍兴，生长于江苏淮安，依然保留某些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有关。

各房间和卫生间都由内走廊连接出入。走廊出口处是夜间警卫值班室，周恩来进卧室休息后，通向周恩来卧室走廊的门就锁上了，钥匙由警卫员保管。

周恩来居住在西花厅，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落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他住进来以后，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

20世纪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保护和加固建筑物，他们抢时间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周恩来回国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

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二十六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

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总理也。”



周恩来在出访途中，此时也是他难得的休息时刻

周恩来是党内做工作最多的人，也是最忙的人。为了争分夺秒，他开辟了“第二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

周恩来是一个真正的忠实、高效、廉洁的人民公仆。他一生都在实践着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担任政府总理二十六年多的时间里，在处理内政、外交和大小公务活动中，他那自觉的强烈的公仆意识是无所不在的，正像他自己说的：“为人民服务就是要像春蚕那样吐完最后一根丝。”

可以说，周恩来是党内做工作最多的人，也是最忙的人。他为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日夜操劳，“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被外国人称为“全天候周恩来”。

他白天忙于开会，接待外宾，有时连吃午饭的时间都没有，只好带些简单的饮食，在驱车途中用餐。深夜才是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处理大量文件、研究每个问题的时候。

在一天里，周恩来唯一的休息时间是在和邓颖超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喜欢听陕北民歌，每当这时他总是要把留声机打开，边吃边听，不时用手指轻敲桌子或是用脚点地，随着音乐拍打，露出安闲、愉快的表情。但就在这个短暂的时间里，当他想起要处理的事，也常常把秘书找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国前几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都是周恩来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的。祖国每条大江大河的治理，每项重点工程的建设，原子弹、氢弹的研制成功，人造卫星的上天，无不凝结着他的心血。他在日理万机中送走了一个个不眠之夜，又迎来了一个个繁忙的早晨。难怪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对周恩来个人提出的唯一请求是：“请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每天多睡两小时。”

周恩来规定，一天24小时，凡有重要紧急的事情，不论他是在睡觉还是在吃饭，主办急件的同志要随时向他报告。有一次河南省发大水，为处理此事，周恩来几天几夜没怎么合眼。那天刚睡下，又来了急件，秘书想周总理太累了，等睡醒了再向他报告吧，就没有叫醒他。他醒来看了急件后，严肃地批评了秘书。秘书心疼地说：“总理，你几天几夜不睡觉，要累垮的。”周恩来说：“我的时间不属于个人。我少睡点觉算什么，发大水关系到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以后要坚决按规定办。”

国内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人。”

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我们只要看一看每一天周恩来的工作日程安排，看一看西花厅那经常不熄的灯火，我们就会想到人民的总理是怎样一种献身精神，那璀璨不灭的灯火是周恩来用生命点燃的！

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时间是从“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开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这里所谓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时刻，甚至到下午一两点钟，偶尔会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厅的服务人员一清早便将卫生间打扫干净，一切生活用品都备齐。白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进行通风换气，夜间则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使室内既保持空

一九六六年元月，周恩来与邓颖超在玉泉山散步



气清新亦使室温相对恒定。

周总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习惯与工作安排是：“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便看手表。他偶尔按电铃叫人进去询问有何急事需要处理。要是时间许可，他也觉得困乏而没有睡够便接着睡。不然，他便按枕头边的电铃呼叫值班警卫人员。他们听到铃声，便进周恩来卧室随他一起到洗手间。

周恩来进卫生间后，有时坐在抽水马桶上就按电铃（电铃按钮在马桶旁的小条几上），把值班秘书叫进来，向他报告电话记录、待批阅的紧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等。有时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来熟悉的老部下）到卫生间来汇报工作，交谈的时间是几分钟，也可长达几十分钟。所以，日子一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赋予卫生间一个雅号叫做“第二办公室”。

秘书们都十分重视这一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么，为这一办公时间，秘书们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他们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周恩来只要睡下三四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国际风云瞬息万变。这一切都连着周恩来的“第二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一般情况下，周恩来在“第二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周恩来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假如“老资格”的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的话，那么卧室就被称为“第三办公室”。周恩来起床后便到“第二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来是在卧室的床上结束一天工作的。

周总理每天深夜或凌晨离开办公室去卧室时总抱着一大摞文件。邓颖超戏称为“他每天总抱着金娃娃”去睡觉。

周恩来洗漱完毕进卧室躺到床上，继续看着“金娃娃”，批阅文件，常常在疲惫不堪时打瞌睡。手里拿着的红铅笔在文件上圈、点、画，到后来则画出一道道弯弯曲曲不规则的线条。有时，工作人员站在旁边劝他休息。他很少答应，只是叫人拿热毛巾擦一把脸，拿点花生米或者苏打饼干给他“充饥”，工作人员看出，其实他是想借此驱除“瞌睡虫”。有时，等工作人员取来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头睡着了，握在手里的铅笔已掉在了地上。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周恩来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周恩来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周恩来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大家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做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周恩来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可是工夫不大，周恩来“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周恩来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周恩来床头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周恩来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周恩来的“办公室”。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周恩来的“第三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

周恩来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周恩来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这样，周恩来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猝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邓颖超手里没有周恩来办公室的钥匙，要进办公室，得事先报告。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是细致认真。他的这种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

周恩来是执行党的纪律的楷模，他的点点滴滴都值得各级干部学习。也许是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养成的严格保密习惯。就拿周恩来办公室门锁的钥匙这么一件事来说，他规定只有三把，秘书有一把，便于他们出入办公室整理文件等；警卫人员有一把，便于清洁和整理房间；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里不离身。

邓颖超手里没有钥匙，她要进办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门告知一声再进去，这是他们夫妻间相约的礼貌与规矩。

周恩来办公室的房间不大，约30平方米。当你推开办公室的门，立刻有一种房间狭小拥挤的感觉，因为屋子里的东西堆得满满当当，空间太小了。

办公室地上铺设绿呢地毯，沉重的玻璃书柜摆在东西北三面墙前。室内有两张铺有绿呢台布的办公桌。一张普通的大办公桌朝南临窗摆放，桌上放了许



■ 周恩来在西花厅的办公室

多文件、文具等办公用品，有一个老式铜座绿色灯罩的台灯。这张办公桌的右侧几案上摆了三部电话机。

另一张办公桌，是一张如乒乓球桌大小的长条形会议桌，沿房间东西向横放着。它几乎占据整个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任何人推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张醒目的、堆满文件的长条形会议桌。桌上的台灯是自制的，有两个20瓦日光灯管。早先因为办公室里秘书多，分工细，故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方安装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总理呼叫各位秘书。“文革”开始后，秘书逐渐减少，最后只有两个人，这排电铃装置也失去了作用。

长条形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摞大小不等的文件堆，就像高矮不一的“小山包”。会议桌的东头留了一点空间，周恩来常在此进餐或接待个别来访客人在这儿谈话，放置茶杯等物品。时下人们常说“文山会海”，周恩来办公桌上的“小山包”可说是地地道道的“文山”了。

周恩来每天都要出席或主持各种各样的会议，还有外事活动等，而家里每天又有那么多文件等着他亲自来批阅。他能不忙不累吗？！

那张临窗办公桌的左手侧放着一个扶手小沙发，那只是一种摆设而已，很少见他坐在这张沙发上休息过。

“文革”初期，因为周恩来多次发作冠心病心绞痛，后来在办公室的西北



■ 周恩来的卧室陈设十分简陋

角安放了一张木板单人床，供他躺在那里小憩，充充电，养养神，或是午睡片刻，以及心脏病发作时卧床休息、服药、作心电图和吸氧气时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单人床的功能慢慢地发生了演变，床上没有了被褥枕头等卧具，而是堆满了文件。原因很简单，就是周恩来没有时间躺到单人床上去“充电”！

周恩来工作常常因过度劳累而感到胸部憋闷不适。他常感到房间里空气不够用，其实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引起心绞痛的表现，这是经心电图检查一再证实了的。但他不肯，确实也没有时间专门躺在床上休息吸氧气。在专家指导下，医护人员自行设计了一套“土造”中心供氧装置，通过曲折的管道系统将氧气直接输送到他的办公桌旁。周恩来在办公室里不知不觉地边办公边吸氧。这样，保证了定时定量供给氧气，亦减少了冠心病的发作机率。

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是细致认真。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周恩来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个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周恩来没有改正过来？周恩来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周恩来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